

## “民间文学志”概念的提出及其学术意义<sup>\*</sup>

万建中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民间文学不等于民间文学作品,而是一种具有美感效应的日常生活方式。在后《集成》时代,单纯以记录民间文学文本为目的的田野作业已变得不合时宜,而且越来越不可行。以作品分析为基本套路的民间文学研究亟待被突破,民间文学志的学术范式便成为田野作业和研究的必由之路,不只是关注语境,而是将演述的行为、场面、过程、在场者的互动关系以及社会历史背景作为考察的重点。对表演过程中审美体验和文学场域的把握,应该是民间文学志的独异性之所在。

[关键词] 民间文学志;演述;学术意义

[中图分类号] I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2015)06-0028-08

2005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民俗通志》,共22卷,其中有《民间文学志》(上下)。这大概是目前为止唯一一部民间文学志方面的书籍。此书主要是全面反映了民间文学在全国流行的概貌,资料来源几乎都是现有的调查和研究成果。这与基于田野作业基础上的民间文学志大相径庭。2006年,笔者在《民间文学引论》中率先提出了“民间文学志”的田野作业概念,并对这一概念加以了定义和阐释:

民间文学田野作业要书写出两种产品:一种是民间文学作品,即民间文学的记录文本。记录文本就是把当地人所表演的内容变成可理解的书写样式。另一种是民间文学志,着重考察民间文学的表演过程。民间文学志与民族志甚至民俗志不完全相同,是紧紧围绕文学(文艺)表演活动的书写成果,其语境可能与一般的仪式过程没有关系。对表演过程中审美体验和文学场域的把握,应该是民间文学志的独异性之所在。这方面“深层描绘”的要求就是,生动地告诉人们“表演是如何进行的”。<sup>①</sup>

这一概念提出之后,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响应。这一方面是由于民间文学研究范式表现为执着的延续性,学者们运用现有的研究范式得心应手,驾轻就熟,急于创新和突破。另一方面也说明民间文学志概念提出的理由和学术意义还需进一步阐发和论证,以期得到学界广泛的理解和接受。

### 一、民间文学就是民间文学生活

民间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生命的文化,是没有从生活中挣脱出来的文化,所以又称之为民间文学生活。这一民间生活是审美意识的起点,属于人类必需的文化形态。民间文学生活充溢着身体和精神的快感,能够给参与者带来身体和精神的欢愉。

民间文学作为民众最基本的生活样式,之所以得以传承,主要不是依靠信仰的支撑,也不是依附仪式的神圣,而是出于民众对审美和美感的基本需要和满足。“日常生活中的满足是两种主要成分,即愉

\* [作者简介] 万建中,男,江西南昌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政府特聘“井冈山学者”,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学理论、民间文学学术史。

[基金项目] “中国学派的田野理论与方法”课题成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SKZZY2014073)。

① 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08.

快和有用性的混合物。……在这两个因素中,愉快同日常生活尤为相关。可以把它界定为伴随和渗透给定时间我们的生理和精神状态的肯定的感情。”<sup>①</sup>之所以定义为民间文学生活,还有两个重要的事实依据,即这是一种重复性的文学实践,任何一个民间文学文本都会成就无数次演述活动,形成了关于这一文本的行为模式和认知模式。还有,这也是一种“自在性”和“自为性”的文学活动,这两个特性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本图式。

民间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审美效应的日常生活形态,往往与其他的生活形态融为一体。民间文学区别于作家文学的本质在于其具有“情境性”(situatedness),或者说是在特定的生活场合中表现出来的。民间文学的演述始终与某一生活情境联系在一起。民间文学与生活情境之间的联结最为牢固,同时也具有多向度的社会意义。只有在民间文学演述的各种因素的关联情境中以及从头至尾的过程之中把握民间文学的生活形态,民间文学才得以被全面理解。譬如,独龙族的“门主”(民歌)贯穿于独龙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是打猎、砍火山、种庄稼、起房盖屋、婚丧嫁娶、采集捕鱼、逢年过节都要围在火塘边对唱、合唱,倾吐自己的喜怒哀乐。<sup>②</sup>这种民间文学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普遍。倘若脱离了这些具体的生活情境,民间文学便无以演述,也失去了演述的必要。在壮族地区,情歌只有在歌墟的情境中才能充分显示出生活的价值。有情境的民间文学活动才能成为重复性实践和相对稳定的仪式,即我们所谓的习俗和口头传统。

民间文学生活并非我们观察到的那么简单,分析起来,其中存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一个村落或社区进行传统民间文学活动时,是从当地人亲身经历和感受的日常出发,伴随着自己对传统眷恋的情感和相关的知识积累,演述可以让在场者完全达到共鸣的境界。这已远远超越了艺术欣赏的层次,而是一次历史血脉的神圣的洗礼,并且使在场者融为一个整体。按照胡塞尔的观点,“只有当个体对其周围的世界拥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感受时,人类生活才能够运行。”<sup>③</sup>相应地,在一个乡村或社区,个体对民间文学生活秉承一贯的感受和体验时,民间文学活动便得以正常展开。

民间文学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是可以给予解释和进行描述的,因为这又是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在民间文学生活中,表现出一种恒常状况以及惯有的情绪和情感。正因为如此,民间文学生活才能够被观察、记录和分析,民间文学志才能够被书写出来。

尽管所演述的并非高雅的文学精品,甚至可能有些俗气,但由于演述的形式和内容都关涉在场者们自身,人们便情不自禁地投身其中,相互感染,沟通心灵,抒发情感。这种反复出现的文学体验和经历将延伸至演述场域之外的生活空间,进而改善个体之间和家庭之间的相互关系。“相比之下,这种情形在‘未受教育’和‘文盲’接受者那里,比在那些习惯于接触艺术和艺术品,习惯于为艺术品所‘占据’的接受者那里更有可能发生。在后者那里,艺术体验是非自然状态的:在欣赏之后,欣赏者没有任何改变,又回到与艺术根本不同的日常生活。”<sup>④</sup>高雅艺术与生活是分裂的,而民间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富有情感的生活方式,并且是最有效地提升人们生活品质的生活方式。生活知识和情感总是表达于民间文学之中,说笑的生活、歌唱的生活、叙事的生活、表演的生活,同时又是交往的生活、对话的生活和沟通的生活。所谓的等级差异、恶意攻击、尔虞我诈等等不和谐的现象在民间文学生活当中都没有市场。民间文学是当地人的自我意识,是共同的文学性记忆。没有一个社会团体和生活方法能够脱离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是我们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较之其他区域,在民间文学活动十分兴盛的乡村和社区的生活更加

① (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 日常生活[M]. 衣俊卿译.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242.

② 杨元吉. 独龙族民间音乐[J]. 民族音乐,2006,(5).

③ (英)戴维·英格利斯. 文化与日常生活[M]. 张秋月,周雷亚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5.

④ (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 日常生活[M]. 衣俊卿译.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105.

美好和幸福。

## 二、“志”与作品不同的学术诉求

民间文学作品只是能够用于人物形象、思想意义、文化内涵、象征符号、表现手法以及母题(主题)、类型、异文、原型、流变和结构形态方面的分析。茅盾的《神话研究》、闻一多的《神话与诗》以及郑振铎的《汤祷篇》奠定了之后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基调。毋庸置疑,迄今为止,这些方面的成果占据了民间文学研究的主要部分,而且是最值得肯定的部分。这些研究充斥明显的文学性质,我们可以定义为“作品分析”,换句话说,长期以来,我国民间文学学科一直处于“作品分析”的时代。

长期以来,民间文学研究形成了一种顽固的路径,就是执着于作品的分析。“事实上,现有民间文学的学科体系主要是依据记录文本建立起来的。没有民间文学的记录文本,就不可能建构民间文学的学科体系,也不可能将民间文学进行比较明确的分类,神话学、史诗学、故事学、歌谣学、传说学等也无从产生。”<sup>①</sup>对民间文学作品的迷恋,原因有二:一是受到作家文学作品批评的影响。相当一批卓有成就的民间文学学者的学术背景是文学理论,老一辈以周作人、闻一多、茅盾、郑振铎、钟敬文等为代表,长辈中以乌丙安、刘魁立、刘锡诚、段宝林、陶阳等为代表。依据他们的理解,民间文学即是民间文学作品。各类民间文学作品集充塞他们的书架,成为他们经常翻阅和研究的主要文本。二是延续了神话研究的范式。神话是文学的母胎,神话研究似乎也成为民间文学学科的母胎。尽管神话研究专注于文献文本,但却获得了令人喜悦的成就,形成了诸多流派,如语言学派、心理学派、历史学派、人类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及女性主义学派等。民间文学学者奢望在口承文学的其他领域复制神话研究的辉煌。殊不知,民间文学的当下性和生活样态为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域。

这种研究景况显然为学科中人所不满足。因为,民间文学并不完全隶属于文学。美国当代叙事学学者华莱士·马丁(Wallace Martin)比较了口头故事和作家文学之后,指出以口头叙事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和文学批评之间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差异:

人类学家碰到的不是原创的、写实的、印刷出来的故事,而是一大堆口头故事,其中许多彼此之间仅有细微的差异。这些口头故事经常包含一些神魔事件,而这些事件与它们在其中被讲述的那些社会的“现实”没有任何明显的关系。几乎在所有的方面,人类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都与文学批评家提出的那些问题相反:不是“为什么这个故事是独特的?”,而是“它如何以及为什么与其他故事如此相似?”;不是“这个(可确认的)作者意味着什么?”而是“当这一(无署名的)集体神话在某些场合被重述时,它发挥什么作用?”对于批评家来说,单独的作品是意义的所在地;而人类学家却至少也要处理一个故事的一系列变体。叙事与日常现实的关系在一种情况中是明显的,在另一种情况中则是隐晦的。视点、人物塑造、描写和文体这类对于文学批评家如此重要的特性在口头故事中几乎是不存在的。批评家精密的解释方法对于人类学家则几乎毫无裨益。<sup>②</sup>

对民间文学文本批评的全面反思兴起于表演理论的引入。表演理论之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主要贡献不是研究方法,而是研究观念。民间文学演述的过程、行为(act/action),以及叙述的文本与叙述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学者们讨论的主要问题。然而,尽管学界对表演、语境、互文性等概念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但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文学志一直没有出现。原因在于“表演只能作为分析文本时的背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只是被作为附带性的东西来看待的。如果文本就只是文本,演出的状况,或社会、文化脉络就只是作为文本的脉络来加以并列地记述的话,那么,即使记述的范围扩大了,也谈不上是什么

① 万建中. 民间文学引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32.

② (美)华莱士·马丁. 当代叙事学[M]. 伍晓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10.

方法论上的革新了。”<sup>①</sup>记录文本或者说作品依旧是叙述和讨论的中心,只不过围绕这一中心,视野更为开阔而已。

民间文学学者绝对不会将自己归为文学批评者的行列。民间文学研究一直没有摆脱文学批评的藩篱,原因在于没有建立民间文学生活的概念。“民间文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不仅仅指民间文学作品,民间文学作品是采风的成果,是对民间文学部分的记录。现有的民间文学作品都没有也不可能涵盖民间文学的全部。……真正的民间文学存在于生活当中,其中的许多部分很难被‘采风’,并用文字描述出来。”<sup>②</sup>如果把歌谣从它生存的具体环境中抽取出来,没有“抒情意味”、“活跃气氛”、“舞蹈的节奏”等等,只有记下来的歌词,艺术魅力就大为减弱,特别是经过文字处理的歌词,往往又失去原歌的意境、格律、韵味,就使人感到兴味索然。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人们在生活中或现场听歌手演唱,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可记下歌词一看,就不感人了,道理就在这里。

民间文学的演述是声音和身体语言的结合,而民间文学作品是部分声音的记录,与身体语言无关。然而,实际上民间文学是身体技能的表现,口腔运动仅仅为身体机能之一部分。民间文学与其他文学形态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宣泄的效果更依赖于身体技能的展示,与作家文学朗诵者的字正腔圆和身体的优雅形成鲜明的对照。民间文学的演述大致表现为两种状态:一是在场者都是演述者,譬如,“阿里里”是纳西族自娱性集体歌舞,因歌舞中的“阿里里”衬词而得名,多在节日喜庆时欢歌,歌者手拉手,肩并肩,围成圆圈,自左向右舞动,三步一甩手抬脚,由一人领唱,众人随和。不论跳多久,都是基本动作的反复,旋律欢快,节奏鲜明,舞步轻盈。在这样以众人“在场为特征的情境中,个体有理由希望一方面自己是人们的一部分,同时也可以偶然引人注目,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与其他所有人的不同会导致别人以一种令人尴尬和羞辱的方法来看待自己,那么极少数人会希望自己与他人不同。”<sup>③</sup>一是演述者只有一位,其他人皆为观众。演述者能够得到其他在场者肯定的回应,并充分施展自己的身体技能以影响周围的人。不论是哪种状态,演述都是由所有在场者共同完成的,在民间文学传统模式的主导之下,演述者与演述者之间,演述者与观众之间构成了互动及协调的关系。即便某位在场者不发出声音,不予动作,他的眼神,他的在场本身都是在烘托现场的演述气氛。

有些民间文学难以用“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日常禁忌语。“按作家文学的标准,此种语言绝不能纳入文学的范畴,因为它既非抒情也非叙事,仅仅是民间某种信仰心态的话语呈现,而从民间的角度,它却是地道的民间语言艺术,与民众的一些基本生存观念密切相关。”<sup>④</sup>民间文学这一概念委实让人产生误导,以为是与作家文学相对应的一种文学形式,殊不知与“创作”出来的作家文学有着天壤之别。

民间文学志记录的是民间文学工作者在田野的调查行为,即“我”与当地民间文学生活的关系。将“我”参与民间文学活动的真实过程呈现出来。民间文学工作者身临其境,体验和感受当地的民间文学。不仅重视演述了什么,而且密切关注演述是如何展开的,如何进行的,谁在演述及在场者的构成。这些都需要“我”的观察、参与、记录和阐述。如果仅仅依靠第三者的转述,或者说离开了“我”的在场,显然难以书写出民间文学志。

民间文学记录文本即作品则不同,民间文学作品完全可以是第三者的转述,民间文学作品的采集人允许不在场。甚至大部分民间文学作品本身就是转述中的转述。而且,仅就记录文本而言,我们很难区分现场演述的直接记录和第三者的转述。对民间文学记录文本而言,要求提供演述者和记录者的基本

① (日)井口淳子. 中国北方农村的口传文化——说唱的书、文本、表演[M]. 林琦译.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114.

② 万建中. 民间文学引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8~29.

③ (英)戴维·英格利斯. 文化与日常生活[M]. 张秋月,周雷亚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74.

④ 万建中. 民间文学引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68.

信息。然而对研究者来说,这些信息毫无用处,充其量只是起到版权认定的作用:一是因为对研究者而言,这些信息诸如人名永远是陌生的、孤立的,不能引起丝毫的学术联想和启示。再就是这些信息与作品之间缺少内在的关联性,所标示的姓名似乎在告诉我们“谁在演述”,可在学术的层面,这种人名与“谁在演述”风马牛不相及。

从这一侧面可以看出,民间文学作品与民间文学志的田野作业有着巨大的差异性。出于某一学术动机,民间文学志的书写者和演述者需要建立观察与被观察的定向机制。民间文学工作者有可能不知晓演述者的真实姓名,却熟悉演述者,了解演述者的演述行为及身体技能,以及演述者与所演述的民间文学之间的表达关系。

### 三、民间文学志写作的必然趋势

民间文学志的提出受到民族志诗学的启示。因为“民族志诗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把简化为文本的僵化的文学还原为具体传播情境中丰富而多彩的活的文学。这一目标首先意味着文学批评家向人类学家学习田野作业的考查方式,尝试从交往和传播情境的内部来体认口传文学存在的条件,进而发现和描述从口传到书写的文学变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信息缺失、传达变形、阐释误读和效果断裂”<sup>①</sup>。民间文学生活是一个整体,脱离了上下文的记录文本即作品很可能陷入被歪曲的境地,加上对“文学性”的追求,加工和添油加醋也在所难免。“在从演说到文字的转换过程中,民间真实的、鲜活的口头文学传统在非本土化或去本土化的过程中发生了种种游离本土口头传统的偏颇,被固定为一个既不符合其历史文化语境与口头艺术本真,又不符合学科所要求的‘忠实记录’原则的书面化文本。”<sup>②</sup>因为这些不真实的书写行为无从考察,也无从追究。而且,由于缺少具体语境,这类文本即作品反而被随意地不断地复制和阅读。民间文学志则要求书写出某一次民间文学行为的具体过程,时间、地点和人物三要素的明确保证了记录和书写本真性的落实。《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之所以遭到诸多诟病,正是由于它是纯粹的作品,而非民间文学志。

民间文学志的写作也是田野作业的必然要求。随着被发明的“传统”的流行,人们对民间文学的演述已不再是为了延续祖先的记忆或是传承口头传统,而是为了满足广大游客对异域说唱方式的体验欲望,游客总是在追寻天然的、本土的民间说唱和演述。民间文学演述的场景中已不再是一个村落、一个寨中熟人的聚集,还有游客的参与,故而民俗主义的视角必须张开。民间文学变成为向游客们兜售经过包装、并且易于吸引消费的展示资源。在这种市场经济和地方政府政绩观的直接支配之下,演述了什么便显得无足轻重。因为为了适应游客的口味,演述的内容被大肆加工,甚至篡改,已远离了原生状态。民间文学本身拥有的“固有”品质只存在于当地人的记忆中。民间文学的演述演绎为取悦游客的人文场景的呈现。民间文学已然上升为文化产品,甚至有人对演述进行专门设计,有的演述模式是某些文化精英的得意之作。这种改变深深地影响人们对民间文学的理解和回应他的方式。如此境况,单纯地记录演述的内容便失去了学术意义。重要的是如何演述和为什么演述。因此,民间文学志就充当了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唯一成果,也只有民间文学志才能将民间文学传统“现代化”的状况和意义表达出来。

如今,在大部分乡村,人们已听不到村民演述农耕生活的各种口头文学了。以民间故事为例。晋代干宝《搜神记》中有“毛衣女”篇,开头指明故事发生在豫章新喻,即现在的江西新余市。此公认为是毛衣女故事(又称为天鹅处女型故事、羽衣仙女故事、天鹅女故事和七仙女故事)最早的记录。日本学者君岛久子认为:“《毛衣女》的产生地——豫章,六朝时原是苗族和瑶族聚居的地方。因此,此故事最早当是

<sup>①</sup> 叶舒宪. 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15~116.

<sup>②</sup> 巴莫曲布嫫. “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以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的“文本透录”为例(下)[J]. 文化研究 2004,(2).

苗、瑶族故事,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得到传播。它不只是中国此类故事的故乡,也是东方此类故事的发祥地。”<sup>①</sup>据此,新余市政府将此故事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却因未能提供活态的故事口传文本而被淘汰。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新余仙女湖和仙女洞的导游,现在谁还会演述这一故事呢?这一故事早已失去了演述的环境,口传的链条已然中断。然而,在新余,还有以仙女命名的学校、道路、村落以及人文景观,许多年轻男女还特意到仙女湖畔集结良缘,仙女故事之符号频频出现并得到广泛使用。这是以现代生活样式讲述着毛衣女的故事。民间文学作品难以寻觅,而民间文学生活仍在持续,并方兴未艾。在汉民族地区,传统的民间文学的命运大体如是。

基于这种现实,《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式的田野作业已变得不太可能,后“集成”时代的显著标志就是单纯以搜集作品为目的的田野作业已一去不复返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时髦的“采风”的概念已极少有人使用,“采风”成为过时的田野作业。民间文学的实际状况让民间文学研究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即城乡一体化进程迅速地导致民间文学口传文本的枯竭,民间文学研究不再可能从田野中获得源源不断的文本资源。这就迫使我们改变原有的民间文学即民间文学作品的立场,在生活世界的层面树立崭新的民间文学观。一味沉溺于民间文学作品分析的研究不可能重现辉煌。挑战总是与机遇并存。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应该正视现实,与时俱进,谋求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文学志的提出正是这一背景下的突破性呼吁。

甚至注重语境的民间文学表演理论也不合时宜,民间文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自然而然成为民间文学志书写的主要内容。“在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看来,文本并非作品,而是语言活动的领域,但文本并不以所指(signified)为中心,反而是以能指(signifier)为中心。文本无意将词与事物一一对等起来,它只重视言说行为本身,不太注重所表达的意义。民间文学本身就是一个言说(演说)的过程,恰好可以满足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路径,而不需要刻意以文本取代作品。”<sup>②</sup>要求跳出“文学”来理解民间文学,在演述行为和过程的语境中考察民间文学,关注身体、声音、场景、行为、对话、互动、演述技艺、演述者的身份与关系及民间社会等以演述为中心的各种维度。

演述者是田野作业重点关注的对象,田野作业的过程就是民间文学工作者对演述者了解、认识和描述的过程。然而,对演述者的了解、认识和描述需要先期理解当地的口头文学传统。不论是演述的内容还是形式,都不是演述者创造的和独享的,演述者总是依据口头传统践行自己的演述。民间文学演述是潜在的“集团行为参照系”(reference group behaviour),成为不断被模仿的样板。表演者和观众一般不以好坏、新旧等标准进行评判。在一个村落或小镇,人们倾向于坚持那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口头传统,倾向于坚持那些已经熟悉的且已建立起来的演唱行为方式。因此,仅仅对某一次民间文学活动的考察还不足以完成民间文学志的写作,全面了解和把握当地的口头文学传统及演述群体是民间文学志写作的必然要求。这对民间文学志的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大概也是真正的民间文学志至今没有面世的主要原因。

#### 四、民间文学研究视域的拓展

当前,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瓶颈,似乎路径越来越逼仄,难以寻觅到新的学科增长点。学术方式表现为极端的重复和单调,根源在于对民间文学学科研究对象的理解和把握缺乏开放意识。如果把民间文学视为可供阅读的记录文本,而对演述的实际状况和生动的过程视而不见,民间文学只能沦为被拆分的词语(符号)、结构、情节单元、人物和母题,与作家文学只不过是下层与上层的区

① (日)君岛久子.围绕羽衣传说谈东方的仙女[J].民话与传承,朝日新闻社,1978.转引自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284.

② 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2.

别。在民间文学界,如今最前沿的研究是立足于表演中的民间文学文本,强调文本与语境的结合,这种仍以文本(表演了什么)为中心的文学思维范式并没有开辟民间文学学科新局面。倘若我们采纳广义的文本概念,将具有娱乐或审美性的民间文学生活当作完整的文本,即民间文学生活文本,这就给研究开掘出蕴含多种可能性的开放的文本资源。这一认定必然赋予民间文学发展和变异自由空间和充满活力的生活态势,让我们不再因传统的口头文学的失传而感到失落。因为民间文学生活总是具有开辟自己生存空间和领域的内在机制。

而面对这样一种充满活力和与时俱进的演述的生活文本,唯有民间文学志的书写可以满足其各种潜在的学术需求。民间文学生活是所有生活中最充满魅力的生活,喜庆、愉悦、狂欢让各族人民在这种生活中乐此不疲。当然,这也是最能引发学术兴趣和想象力的生活方式,学者们在田野中可以从不同角度对演述的生活文本进行富有创建的解读和建构。运用相关学科诸如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民族学乃至社会学的方法也变得理所当然起来,并且可以终于跳出文学思维范式的传统套路,张开最为开阔的研究视角。

现今,民间文学大都不是单独的文学活动,政治权利、国家在场、演述资本、精英利益、游客导向等等都直接在干预民间文学活动。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政府重视的领域之后,民间文学的演述便备受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驱动,演变为一些部门和精英炫耀政绩和敛财的工具。在各种强权的合力之下,民间文学文本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于是,采集传统的民间文学记录文本变得异常艰难。然而,围绕民间文学所呈现的各种关联因素和利益指向却可进入民间文学志书写的策略当中。民间文学志关注的是民间文学生活的事实,至于文本是否传统、是否口口相传并不在意。新余市仙女湖和仙女洞景点的导游不停地向游客讲述毛衣女的故事,目的在于招揽顾客,为了当地旅游业的兴盛,并非有意识地传承这一民间故事。导游的口传技艺是严格培训的结果,因为面对同一景点,所有导游讲述的内容都大同小异。毛衣女故事俨然成为景区景点的有机组成部分。民间文学志的书写显然不能只是讲了什么,而应涉及为什么要这样讲,毛衣女故事之于景区开发的意义,游客的认同度,以及景点设计与毛衣女故事的关联性等问题。这些皆为民间文学志所要解答的问题。

母题(主题)、类型、异文、原型、流变和结构形态等这些经常出现的关键词已成为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的桎梏。民间文学学科之所以在教育部的学科目录上没有独立的位置,变得萎靡不振,缺乏朝气,与陈旧的学术范式休戚相关。一些原本从事民间文学的学者纷纷倒戈民俗学,也多出于民间文学学科的不景气。民间文学志是重振民间文学学科雄风的有效途径,可以为多学科交叉研究提供诸多可能性。相对而言,民间文学作品是固定的、相对不变的,即便有异文,也是大同小异。而民间文学志面对的是群体共同参与完成的开放性的文本,有确定的时间和地点(每次演述都不一样),表现为无限的意义生成。文本的开放性给予民间文学更宽阔的生存空间和多向度的发展机遇。其生活意义远远超越了记录文本的意义。

尤其可贵的是,民间文学志注意到了在场者的热情与主动,把“人”(而非仅仅是演述者)当作考察的重点。在场者对民间文学文本的参与和建构,使得民间文学文本形态更加丰富和富有感染力。在场者在体验民间文学生活时,总是与自己的民间文学经验分不开,一旦自己的经验与演述的内容合拍,参与的热情便更加高涨,快感也更加强烈。在场者对演述的某种理解和与演述主题相契合所产生的快乐正是民间文学志应该着重表达的方面。同时,也没有忘记“我”(学者)也是在场的一员。“我”成为凸显民间文学文本主体性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民间文学文本来讲,不在乎文本本身是谁演述的和哪些人完成的,而是指文本本身意义的生发与阐释。不同的民间文学演述场合、不同的演述过程、不同的书写角度和书写动机都给予“我”的主体性权力。作为开放性的文本,民间文学的主体性不仅反映了民间文学生活的丰富性和独特性,而且让解释文本拥有了方法的多样性和广阔的学术空间,原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可以成为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的一个契机。然而,由于固守陈旧的民间文学观念,非但没有帮助民间文学学科走出困境,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民间文学即民间文学作品的刻板认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中,民间文学几乎都以作品的面貌出现,并进入省级和国家级非遗名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框架里,民间文学成为一成不变的、毫无生活气息的记录文本。这大概也是民间文学未能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原因。受到“作品”的严重掣肘,在十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门类中,民间文学代表作的申报书写得最没有生气。一般都是将传承人抬出来撑撑门面,把民间文学的传承和可持续全部托付给了歌手和故事家们。有的为了申报成功而刻意为之。其实,即便有位老年人会讲某一地方传说,也只能说明当地人对此传说仍有记忆,传承的环境却可能早已荡然无存,因为此传说不再传也不再说了。民间文学志则无须囿于这些局限,它本身就是可持续的文本。记忆和传承民间文学的不仅是传承人,更是民间文学生活本身。纵使没有了传承人,一些地方传说成为文人创作的素材,或演变为地名、村落名,或与某处风景直接相关,出现在当地民间文学作品集中,或得到当地文化精英重点关注,或申报了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难道不是记忆,不是传承吗?

从民间文学志的角度审视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回归民间文学的本真,还原民间文学的本来面目。不仅如此,民间文学志还能够避免为申报而申报的绝对功利性态度,迫使人们(特别是地方文化精英)关注民间文学的生存环境、演进状况和日常生活的意义,并且考量民间文学的发展境遇,引导人们面向民间文学的未来。表面上看,这似乎偏离了民间文学,事实上恰恰相反,民间文学志注重的是民间文学的生产过程、生存状况、命运和现代价值,这正好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的宗旨和动机。

## The concept of “the history of folk literature” and its academic significance

WANG Jian-zh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Folk literature is different from folk literary works because it is a daily lifestyle with some aesthetic effects. In the era of post-Anthology of Chinese Folkloric Stories, the field work simply with the purpose of recording folk literary texts is no longer proper or workable. The study of folk literature main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works requires breakthroughs. Thus, the academic paradigm of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folk literature consequently becomes the proper approach to the relevant field work and researches, whose features include the following: the focus is not only on context but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performance, narration, scenes, actions and process as well as the socio-historic backgrounds. The uniqueness of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folk literature finds expression in the grasp of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literary field during the performance.

**Key words:** history of folk literature; performance and narration; academic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 黄龙光]